

长征纪实

卜行觉 周碧玲◎编著

ZHENG CHENG JUN HUN

征程军魂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长征纪实

K264.4

10

:3

征程军魂

ZHENG CHENG JUN HUN

卜行觉 周碧玲◎编著

中国 社会 出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征程军魂 / 卜行觉、周碧玲编著. —北京: 中国出版社,
2005. 7

(长征纪实丛书)

ISBN 7 - 5087 - 0699 - 4

I. 征... II. ①卜... ②周... III. ①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4 ~
1936) —史料 ②中国共产党—领袖—生平事迹 IV. ①K264. 406
②K827 =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83519 号

书 名: 征 程 军 魂

编 著: 卜行觉 周碧玲

责 任 编 辑: 孙晓青

出 版 发 行: 中国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 联 方 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 66051698 电传: 66051713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装 订: 北京京海印刷厂

开 本: 153mm × 225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45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5087 - 0699 - 4/K · 131

定 价: 22.00 元

(凡中国出版社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众望所归 扭转乾坤	
——长征中的毛泽东	(1)
胸怀坦荡 殚精竭虑	
——长征中的周恩来	(28)
度量如海 意志如钢	
——长征中的朱德	(49)
转折关头 挺身而出	
——长征中的张闻天	(66)
遵义会议 稼祥首功	
——长征中的王稼祥	(82)
忠于职守 善于思考	
——长征中的聂荣臻	(90)
依靠群众 引导群众	
——长征中的罗荣桓	(116)
横刀立马 彭大将军	
——长征中的彭德怀	(136)
见证大事 细说长征	
——长征中的杨尚昆	(151)
大是大非 当断则断	
——长征中的叶剑英	(178)

叱咤风云 驰骋万里	
——长征中的贺龙	(195)
先遣探路 灵活机动	
——长征中的任弼时	(214)
大局在胸 默默抗争	
——长征中的徐向前	(232)
骁勇善战 身先士卒	
——长征中的徐海东	(245)

众望所归 扭转乾坤

——长征中的毛泽东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朱德、周恩来等，艰苦创业，开辟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接连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的四次军事“围剿”。可是，在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时，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竭力反对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战略和策略，推行错误的军事作战方针，结果，使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了失败。1934年秋天，国民党军队逐渐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腹地推进，根据地越来越小了。在红都瑞金，已常听到敌机刺耳的轰鸣声，战争的紧张气氛愈来愈浓了。在敌人的猖狂进攻面前，“左”倾错误领导者张皇失措，决定仓促撤离根据地，向湘西实行战略转移。

决定这次战略转移的，是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战略转移的重大决定，中央政治局没有开会讨论；红军转移的具体计划，连毛泽东等人事先也不清楚。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进行得比较晚。一方面，仓促做些转移的物质准备，筹集粮秣，增产弹药，赶制戎装等；另一方面，扩编红军，确定转移干部的名单，哪些人走，哪些人留。中央一级的干部都由中央负责人博古批准决定。

当时，毛泽东名义上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但他并没有实权。从1931年赣南会议到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整整三年内，毛泽东一直身处逆境，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他许多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被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保守退却”、“右倾机会主义”。在不短的时间内，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又来自自己的党内。这是严峻的考验。如果没有坚强的信念、宽阔的胸襟，一个人是很难经受得住这种考验的。

1

征程军魂

毛泽东在这些日子里，一直表现得十分从容沉着。他坚持原则，绝不放弃自己正确的符合实际的主张，同时又顾全大局，尽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亲眼目睹这一切的李维汉曾描述道：“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那时王明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整人整得很厉害，不是把你拉下领导职务就算了，还批得很厉害。毛泽东在受打击的情况下，仍能维护党的统一，坚持正确的路线和主张。”

1934年6月下旬，毛泽东在会昌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回瑞金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讨论红军在作战不利形势下的对策。实际上，中央书记处5月间已向共产国际请示，准备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共产国际也已复电同意，可是在这次会议上对此并没有传达。毛泽东发言时提出：在内线作战陷于不利的状况下，中央红军应该转移到外线作战；至于转移的方向，中央红军已不宜向东北，可以往西。会议没有接受这个主张，只是决定派红七军团六千多人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派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创立新的苏区。这两支部队在7月间出发，用周恩来的话说：“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但由于转到外线去的兵力单薄，没有能起到吸引国民党军从中央苏区调出的作用。

7月间，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迁到瑞金以西的背梅坑，毛泽东也搬往高围乡云石山一个大庙里居住。依据共产国际关于主力转移时开展游击战争配合的指示，中革军委布置他写一本关于游击战争的小册子。经过将近一个月，他写成了约三万字的《游击战争》一书，共分三章。第一章《概论》，论述游击队的任务、组织以及游击队如何发展成为红军。第二章《游击战术》，论述游击队战斗动作的要则、袭击驻止和行动的敌人、破坏敌人的后方、对付敌人的“围剿”和追击、关于行军宿营给养卫生等事项。第三章《游击队的政治工作》，论述游击队政治工作的目的、游击队部队内的政治工作、游击队在地方居民中的工作、游击队破坏敌人部队的工作。他当时的警卫员陈昌奉回忆说：“有好几次主席让我把他写好的东西，连夜送下山去给周恩来副主席他们看。写的什么当时我们

不知道。后来主席请人把写的东西抄清，用蜡纸刻出来，通过我们中央政府的发行科，发到了各个县和区。我们警卫班的同志因为参加印刷，每个人都留了几本学习。直到这时候，我们才知道写的是有关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到红军大转移时，这本书才下发到各部队。

前线的战局越来越不利，东线和北线都被突破，西线也更加困难。打破敌军“围剿”已不可能，只剩下战略转移这一条路了。毛泽东心情焦急，向中央书记处要求到赣南省去视察，得到了同意。9月中旬，他抵达赣南省委所在地于都。

此时，中共中央已着手准备西征到湘鄂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没有向毛泽东透露。博古、李德还曾想不带毛泽东走。担任李德俄文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

毛泽东刚到于都，就接到周恩来的长途电话，要他着重了解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他立刻召开各种会议做调查，还找那些从敌占区或刚被敌军占领地区过来的商人和其他人员详细了解敌人的动向。9月20日，毛泽东急电报告周恩来：“信丰河下游从上下湾滩起，经三江口、鸡笼潭、下湖圩，大田至信丰河沿河东岸十里以内一线，时有敌小队过河来扰，但最近一星期内不见来了。”电报最后说：“于都、登贤全境无赤色戒严，敌探容易出入。现正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哨及肃反。此复。”这个电报为中央下决心战略转移时从于都方向突围，起了探路的作用。

10月初，毛泽东接到中央“有特别任务”的秘密通知，要他立刻回瑞金。毛泽东骑马赶回瑞金，先到中革军委向周恩来等报告了于都的敌情、地形、河水干枯等情况。然后，在云石山古庙里，召开了中央政府各部负责人会议（又称青山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吴黎平回忆说：“毛泽东同志给大家宣布和说明了这一撤离苏区的决定，强调了两点：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当时，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瞿

秋白希望随主力红军一起转移，但博古等不让他走。瞿秋白请毛泽东给中央说说。毛泽东说，我已经同他们讲过，但“不顶事”。

毛泽东回到家里，抚摸着天真活泼的小孩毛毛，心里很难受。过了一会，毛泽东告诉贺子珍：“中央规定，红军这次转移，女同志一律不得跟着队伍走，孩子更不能带。”望着贺子珍，他又说：“我怎么舍得把你们留下呢？”

毛泽东从政治局常委张闻天那里得知政治局委员要分散到各军团去随军行动的消息后，立刻到中革军委提了两条意见，第一，在转移时将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不要分散到各军团；第二，应带一部分女同志走。他得知中革军委已派部队到于都河搭浮桥，准备大部队从那里过河，又策马赶到于都。

毛泽东刚到于都，就接到中革军委的电话，说中央决定带走30名女同志，其中包括贺子珍，把她们编在卫生部休养连，但不能带孩子。毛泽东立即派警卫员回瑞金通知贺子珍：小毛毛只能托付给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的毛泽覃、贺怡照顾了。

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人员共八万六千余人，从瑞金等地出发，被迫开始长征。

毛泽东在于都做好安排后，于15日在县城谢家祠参加由中共赣南省委召集的省、县、区三级主要干部会议。他在会上说：敌人这次进攻苏区，采用的是堡垒政策，一直打到我们中央苏区门口，企图断水捉鱼，全部消灭红军。我们红军主力部队要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打击和消灭敌人。并且对将要留在中央苏区的地方干部说：你们这些在地方工作的干部，仍然留在苏区，团结人民，开展游击战争。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10月18日傍晚，毛泽东带着警卫员离开于都城，踏上征程。他的全部行装是：两条毯子，一条被单，一块油布，一把雨伞和一个书挑子。

刘英过了于都后看到毛泽东，就问：“你9月份到于都是有‘特别任务’的吧？”她后来回忆道：“毛主席这才告诉我，他来于都主要的任务是察看地形，选择突围的路线。现在我们利用枯水

期，在选定的地点架了五座浮桥，安然地过了于都河，走的就是毛主席选定的路线。”

部队走过固陂镇，宿营了。从瑞金来的贺子珍不久也到了宿营地，毛泽东见了问道：“你们走得不慢呀！怎么样？同志们都好吧？”

贺子珍走到毛泽东跟前说：“队伍都出发了，秩序很乱，好像没有什么组织似的。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几位老同志全来了。总卫生部休养连的同志们都很好。”她接着说：“泽覃弟决定留在苏区打游击，牵制敌人，配合红军主力转移。何叔衡同志也留下了。我离开瑞金时，何老让我向你问好。”停了一会，贺子珍又说：“前几天，接到你的信。按照信上的意见，我离开瑞金的前一天下午，把小毛送到了泽覃弟和贺怡那里，请他们代管。小毛不肯和叔叔、婶婶留下，喊着闹着要跟我来，要找爸爸。”她的眼圈有些发红了。

毛泽东接着说：“小毛交给他叔叔、婶婶代管，过几天会习惯的。等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再回去接他。现在不允许我们带上孩子打仗。”在战争环境中，这个孩子被寄养在当地老乡家，后来再没有找到。

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是严格保密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布置了几道封锁线，却不知道红军往哪个方向突围，在中央苏区西南方向的第一道封锁线上部署的兵力并不强。10月21日夜，红一军团在赣县王母渡、信丰县新田之间突围。到25日，中央红军经过战斗，全部通过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毛泽东深有感慨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就要走出中央苏区啦！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就同王稼祥、张闻天一起行军，开始讨论第五次反“围剿”不能取胜的问题。

11月上旬，中央红军顺利地 in 湘南通过第二道封锁线。这时，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因患疟疾发高烧。毛泽东把自己的担架让给他，安慰他说：“同志们抬你走是要累一些，但这不要紧，因为我们都是同志。”11月中旬，他们在湘南越过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潇水、湘水地区。

蒋介石判明红军西进的意图后，立刻部署“追剿”和堵截，

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地区。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局势，毛泽东认为湘南地区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有利于红军的机动作战，提议乘国民党各路军队正在调动，“追剿”军主力薛岳、周浑元两部还没有靠拢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也向中央建议：“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

博古、李德拒绝了这些建议，消极避战，丧失了一次较好的战机。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这是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27日，红军先头部队顺利控制了渡口。但因队伍携带的辎重过多，行动过缓，大部队还未过江，就遭受刚刚赶来的优势敌军的夹击。毛泽东在激战中随军委纵队从花村渡过湘江。

中央红军主力突破湘江封锁线，跳出了包围圈，使蒋介石消灭红军于湘江东岸的计划失败，但红军自身却付出沉重的代价，由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为三万多人。这时，博古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一筹莫展。李德一面唉声叹气，一面却诿过于人。他先拿红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开刀。这个师在湘江岸边进行阻击，被打垮了，只有负伤的周子昆等十多人突围出来。李德指责周子昆临阵脱逃，粗暴地训斥道：你的部队呢？没有兵还有什么脸逃回来！命令警卫班将他捆起来，送军事法庭处置。警卫班战士一个也不肯动手，在场的博古默不作声。毛泽东便直接出来干预，说：“周子昆交给我处理。”他同周子昆谈了话，鼓励他好好干，继续带兵打仗。李德知道后，气得暴跳如雷，说毛泽东“收容败将，笼络人心”。

突破湘江遭到惨重损失后，指战员们开始思考，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广大干部眼看着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连连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第四次反“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后达到了

顶点。

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又和同行的王稼祥、张闻天一起分析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错误，认为红军已经不能按原计划行动去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了。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写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五次反‘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这时，蒋介石已觉察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集结近20万军队，设置四道防堵线，阻止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博古、李德却仍坚持原定计划，准备率领红军继续往蒋介石布置好的包围圈里钻。

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这时，博古、李德已因湘江失败而垂头丧气，指挥红军的任务已转移到周恩来肩上。周恩来赞同毛泽东的主张。

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城恭城书院举行临时紧急会议，参加人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会议由周恩来召集，讨论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李德、博古不顾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仍坚持去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

毛泽东说明红军主力现时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他又根据破译敌台的电报材料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在发言中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等也赞同这个主张。博古不再固执己见，李德因为自己的意见被否定而提早退出会场。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

红军主力西进，在12月15日攻占贵州黎平，但北上还是西进的争论并没有结束。18日，毛泽东在黎平城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继续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博古又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李德因

病没有出席，但托人把他坚持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会上。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根据他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会后，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大发雷霆，向周恩来提出质问。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说：两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我们又马上把灯点上”。博古尽管自己意见被会议所否定，还是服从会议决定。当他知道周恩来和李德吵起来时，对周恩来说：“不要理他（指李德）。”

根据黎平会议的决定，中央红军挥戈西指，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原有部署，而且连战连捷，部队的面貌为之一新。军委纵队政委陈云后来以廉臣的笔名发表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赤军由湖南转入贵州，此时确缴获不少。侯之担部至少一师人被缴械，并连失黎平、黄平、镇远三府城，尤其镇远为通湘西之商业重镇，赤军将各城市所存布匹购买一空。连战连进，此时赤军士气极旺，服装整洁。部队中都穿上了新军装。在湘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矣。”

1935年元旦，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地区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次否定李德、博古提出的“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谋图进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红军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主力红军渡过乌江后，“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

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并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在实际上取消了以往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同时，在黎平会议后，已重新任命被李德、博古派到红五军团当参谋长的刘伯承为军委总参谋长。

但争论仍没有结束。正如周恩来所说：“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烈，在争论的中间，毛主席又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王稼祥回忆道：“一路上毛主席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主席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主席的决心。”

此时，王稼祥向毛泽东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建议他先同张闻天通通气。张闻天也同意王稼祥把李德、博古轰下来的意见，并且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

1935年1月7日，红军解放了黔北重镇遵义。毛泽东同周恩来、朱德等随军委纵队于9日下午进入遵义城。

这时，蒋介石得到空军的侦察报告说红军进驻遵义地区后方向不明，批准“追剿军总指挥”薛岳的请求，令第一纵队吴奇伟部集结贵阳、清镇一带整训待命；第二纵队周浑元部在乌江南岸对遵义方向警戒。这在客观上给中央红军的休整提供了条件。

毛泽东、王稼祥等向中共中央提出，立即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伍修权回忆说：“这时王稼祥、张闻天同志就通知博古同志，要他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通知周恩来同志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过去在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博古意识到这次会上必有一场争论，事前进行活动。支持博古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曾几次找聂荣臻谈话，要聂在会上发言支持

博古。聂荣臻没有答应。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

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城红军总司令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会议，共20人。

会议由博古主持，并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种种客观原因。周恩来作副报告，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随后，由张闻天代表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尖锐地批评“左”倾军事路线。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他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会后，陈云在传达提纲中说：“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

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初曾多次讲到凯丰当时用反批评的方式来维护博古、李德。他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了。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会议采纳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决定红军准备北渡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经过3天热烈讨论，会议还作出下列

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最后决心的负责人。”

遵义会议后不久，在常委中重新进行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曾列席遵义会议的伍修权指出：遵义会议上只批判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在军事上的错误，没有提政治问题的错误，是毛泽东的英明决策。当时，曾经有人提出批判和纠正六届四中全会的政治错误，毛泽东机智地制止了这种做法。正是这样，才团结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

毛泽东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经历了长时间被孤立的痛苦磨练，他深切地领悟到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长征路上，他在中央领导层中一个一个地做工作，让正确的意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这才实现了遵义会议的巨大转折。贺子珍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我感叹地讲：“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她比别人更清楚地察觉到：“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遵义会议后的新中央，改变“左”倾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对犯了错误的人既严肃批评，又热情团结。同时，对以前受到错误打击的人进行平反。江华回忆说，“毛主席有发言权了，我们这些受错误路线打击的人，也逐渐得了‘赦免’。”罗明回忆道：“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指示要起用受王明路线打击的干部。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通知刘晓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我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

被诬陷为江西“罗明路线”代表的邓小平，在遵义会议前夕已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对被诬陷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而被开除党籍判刑5年的萧劲光，遵义会议刚开完，周恩来

就向他宣布：“会议认为，你的问题过去搞错了，取消了对你的处分，决定恢复你的党籍、军籍，中央还考虑要重新安排你的工作。”

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又作了新的部署，调集 40 万兵力，企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乌江西北地区。红军面临的局势变得仍很严峻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决定，部队从 1 月 19 日开始逐次向北转移，在川黔交界处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20 日，中革军委下达《渡江作战计划》，决定在宜宾、泸州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

红军分三路在 27 日全部推进到赤水河以东地区。毛泽东在向土城镇行军途中，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商议，认为道路两边是山谷地带，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可以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勋祺师。

这场战斗是由毛泽东提议而经红军总部决定的，以红三、红五军团为作战主力。战斗在 28 日凌晨打响，川军遭到重大打击，红军也付出不少代价。经过连续几个小时激战，没有取得较大战果。后来从抓获俘虏的番号中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敌军不是 4 个团六千多人，而是 6 个团一万多人，对川军的战斗力也估计不足，它的增援部队又即将开到，战局逐渐对红军不利。红军立刻由陈赓、宋任穷率领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在朱德亲临前沿阵地指挥下，干部团猛打猛冲，终于打退了川军的进攻，稳住了阵地。毛泽东在山头上看到这种情景，称赞道：“陈赓行，可以当军长。”接着，原已北上进攻赤水县城的红一军团赶回参战，把阵地巩固了下来。这就是土城战斗。

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会议根据各路国民党军队正奔集而来进行围堵的新情况，判明原定在这里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能实现，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进。这次战斗打得并不好。博古那时曾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1 月 29 日，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这时，川军潘文华部 36 个团已部署在长江南岸的赤水、古蔺、叙永一带，